

媒介化视域下摇滚乐歌词重构策略研究

邢新宇¹ 李滨惠² 孔祥伟³ 孟庆天⁴ 苏爱民⁵

(1.韩国江原国立大学, 韩国 春川 24286; 2.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31; 3.韩国世宗大学校, 韩国 首尔 05006, 4.韩国岭南大学, 韩国 庆山 38541, 5.全北国立大学, 韩国 全州 54896)

摘要: 在当今媒介平台深度参与内容生产的时代,中国音乐综艺的文本呈现逻辑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摇滚乐在主流综艺中的传播方式愈加依赖媒介机制的调节。摇滚作品所具有的反叛姿态、批判锋芒和青年亚文化属性,使其在进入平台化制作流程后面临较高的审查危机,歌词往往需要经过不同程度的替换、弱化与重塑才可播出。本文基于《乐队的夏天》中三十余首具有代表性的摇滚作品,构建“原词—播出词”对照体系,并使用描述性内容分析方法总结歌词被改动的类型与特征,从媒介化视角解释其背后的表达逻辑。研究显示,综艺节目中的摇滚歌词改写主要呈现“语言替换”“情绪调适”“意象结构”三种模式,这些变化体现了审查体系、节目品牌调性、叙事节奏与算法规则等多重媒介逻辑对文本层面的深度介入。尽管摇滚乐的亚文化特征被一定程度地弱化,但社会表达还在,它以隐喻化、情绪化与正向化的方式保留。此研究可为摇滚乐歌词创作、媒介化构建与青年文化理解提供启示。

关键词: 媒介化; 摆滚乐; 歌词改写; 综艺节目; 文化构建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79

一、引言

随着媒介平台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音乐综艺的内容处理方式出现了明显的结构化变化。节目在录制、剪辑、审核与最终呈现等环节中,都需要在制度尺度、平台调性与受众期待之间寻找平衡,使得原本具有鲜明语言风格和文化符号的音乐文本往往经历再加工。对于表达强度较高、文化身份突出、情绪能量强烈的摇滚作品而言,这种再加工尤为明显。节目为了确保内容的可播性,会在多个层面进行调整,包括词语替换、情绪弱化与意象重构等。

从本研究整理的三十余首摇滚作品的“原词—播出词”对照情况来看,歌词变化并非偶发,而是呈现出具有体系性的表达趋势。例如,涉及性暗示、暴力、粗口或宗教等可能触及尺度风险的表达,往往通过更抽象、更温和或更中性的语言加以替换;原本具有鲜明现实感或批判意味的句子,也会被处理为情绪化、隐喻化的表达方式,以降低潜在争议。比如,“我想重复死亡”在播出版本中变为“我想重复 Goodbye”,将强烈的生命终结意象弱化为较为柔性的离别情绪。同样,涉及社会结构、价值批判或现实压迫等内容,也常被节目以更加普适、去指涉化的方式重写,使其不再直指具体情境。

理解这些变化的发生机制,需要放在媒介化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考察。Hjarvard (2008) 指出,媒体已成为文化生产中的独立力量,它不仅传递内容,也重塑内容的呈现方式和意义结构。Couldry 与 Hepp (2016) 进一步强调,媒介系统会通过其操作逻辑与表达规则,对现实进行再建构,使文化文本在进入媒介环境后必须适应既有表达边界。在音乐综艺中,这种媒介逻辑往往体现在“剪辑—审核—精剪”的流程中,节目组会依据传播风险、情绪氛围、叙事节奏等因素重塑歌词,使其符合平台化传播的整体调性。

作者简介: 邢新宇(1998-),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流行音乐研究;

李滨惠(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

孔祥伟(1992-),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声乐演唱方向;

孟庆天(1991-),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学理论;

苏爱民(1997-),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学。

通讯作者: 李滨惠

从国内研究看，电视娱乐节目在内容表达上通常受审查制度、市场竞争与频道定位的共同影响，更倾向于朝向温和、主流与情绪友好的方向移动（田瑶，2016）。因此，摇滚歌词在综艺语境中的变化并非个别处理，而是节目在平台生态下对表达方式进行主动调适的结果。De Kloet (2010) 在讨论中国青年音乐文化时也指出，流行音乐在平台化环境中往往需要在表达自由与文化工业逻辑之间不断协商。总的来看本研究通过构建摇滚作品“原词—播出词”的系统性对照，试图从具体的改写类型出发，分析节目制作过程中歌词再加工的逻辑。研究的核心目的不仅在于呈现改写本身，更在于在媒介化的框架下理解摇滚文本在平台语境中如何被重新组织与生产，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作品原本承载的青年文化象征与情绪表达。

二、理论框架

本研究以媒介化理论作为分析基点，重点探讨媒介逻辑如何影响综艺节目中摇滚歌词的呈现形态。媒介化强调媒体体系通过其符号机制、制度结构与操作逻辑深度参与社会文化表达 (Hjarvard, 2008)。因此，音乐综艺节目对歌词的修改，不仅是审查层面的要求，也是媒介逻辑嵌入文化生产的一种表现。

首先，媒介化理论指出，媒体会通过其自身规则塑造内容的表达方式，包括语言风格、情绪强度和叙事节奏 (Hjarvard, 2008)。摇滚歌词在综艺节目中的改写正是这种“媒体逻辑优先”的结果。其次，这种逻辑通常通过“剪辑—审核—改编”机制落实。Golden (2010) 认为，剪辑不仅改变文本呈现顺序，更会重新定义意义结构，因此歌词改写本质上属于媒介再生产的一部分。再次，“可播出表达”是歌词改写的重要导向。Siles (2024) 指出，平台时代的音乐内容需要兼具情绪友好性、品牌适配性和传播安全性，才能获得稳定的曝光机会。此外，Couldry 与 Hepp (2016) 提出的“媒介建构现实”观点也提示我们，媒介系统会预设可接受的表达边界，使创作者在进入媒介环境前便需主动调整。

基于以上理论，本研究构建的框架可概括为：媒介逻辑构成宏观背景；剪辑—审核机制是操作路径；“可播出表达”是核心标准；最终形成原词与播出词之间的系统差异。该框架为理解歌词改写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揭示音乐综艺节目中摇滚歌曲在播出前经历的歌词改写特征及其背后的媒介化机制。为系统呈现“原词—播出词”之间的差异，并解释这些差异如何与节目制作流程相关，本研究依据描述性内容分析的原则，对样本文本进行整理、比对、分类与解释。本章从数据来源、样本构成、研究方法、编码体系与研究流程等方面对研究设计进行说明。

研究数据来源于《乐队的夏天》音乐综艺节目中具有代表性的摇滚作品。研究者根据节目播出片段、官方音源、音乐专辑版本以及音乐人公开演出版本收集每首歌曲的原始歌词，并与节目播出版本进行逐句比对，建立“原词—播出词”对照文本。最终共整理三十余首具有明显改写特征的摇滚歌曲作为分析样本。选择这些样本的理由在于：其一，摇滚作品本身具有较强的语言张力和情绪强度，容易在综艺节目中触发语言尺度与情绪尺度的调整；其二，这些作品的播出版本均有可清晰识别的语义或意象变化；其三，原词和播出词均可从公开渠道验证；其四，平台型综艺节目具有相对稳定的制作流程，使改写现象具有典型性。样本的构成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音乐综艺在歌词呈现上的媒介化加工方式。

本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性内容分析与文本对照分析两种方法。描述性内容分析强调从文本出发，通过对材料的内容、结构与外显特征进行系统梳理，以呈现其基本面貌与表现规律。该方法常用于教育与传播领域的文本研究，可用于概括文本处理方式、归纳呈现模式等基础性质的分析（袁振国，2000；叶澜，1999）。在本研究中，描述性内容分析有助于识别音乐综艺在处理摇滚歌词时所形成的典型加工方式，如语言净化、情绪削弱、表达模糊化等趋势。

文本对照分析则以“原词—播出词”的逐句比对为核心步骤，通过整理两者在词汇选择、情绪表达与象征意涵上的差异，进一步识别节目制作中的具体改写策略。为确保分析的系统性，研究首先为观测样本建立原始歌词与播出版本的对照表，并标注所有发生变化的语句；随后依据改写特征，将变化点按照语言、情绪与象征三个维度进行分类；最后结合媒介化理论，从节目制作逻辑、审查要求与表达策略等角度解释这些改写背后的机制。通过上述方法，本研究能够在保持文本细读深度的同时，从整体层面把握音乐综艺在歌词加工与再表达中的规律性倾向。这一研究策略兼具可操作性与理论解释力，符合内容分析在文本研究中的使用原则 (Krippendorff, 2004)。

在分析全部样本之后，本研究基于归纳法构建了摇滚歌词改写的三大类八小类编码体系。第一类为语言替换

类，包括脏话或粗俗表达的替换、性暗示词语的删除或中性化处理、暴力意象的弱化以及宗教类词汇的规避与替代。例如，将具有明确宗教含义的表达替换为心理活动类表达，或将带有性暗示的语句转化为身体动作类描述。第二类为情绪调适类，主要表现为对强烈负面情绪的弱化，如将“死亡”替换为“Goodbye”，将愤怒表达调整为遗憾式表达，或将对抗性的语言柔性化处理，使其更符合综艺节目整体的情绪走向。第三类为意象结构调整类，包括对社会批判或现实指涉的意象进行模糊化处理，将具象象征转化为抽象情绪表达，以及对象征意义较强的词句进行中性化处理。该编码体系能够全面呈现综艺节目对摇滚歌词的改写方向，也与节目制作中普遍存在的“可播出表达”逻辑高度一致。

研究流程包括以下步骤：首先，获取样本歌曲的原词与播出词并进行文本核对；其次，将所有样本整理为逐句对应的对照表，以确保能够准确识别每一处改写；第三，识别语言替换、情绪弱化、意象模糊等类型的改写点，并依据编码体系进行分类；第四，通过对所有改写点的集中分析，总结摇滚歌词在综艺节目中的改写规律；最后，从媒介化的角度解释改写背后的逻辑，包括审核需求、节目叙事节奏、情绪管理以及平台化传播的要求。整个流程强调文本材料的可靠性与呈现方式的透明性，使研究结果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摇滚歌词在综艺节目中的媒介化呈现机制。

四、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三十余首作品的“原词—播出词”逐句对照，可以发现综艺节目在呈现摇滚音乐时普遍存在结构化的歌词改写现象。这些改写不仅在语言层面表现为替换、弱化或模糊化，也在情绪与意象层面呈现出明显的趋同趋势，反映出节目制作流程中“可播出”的规制方式。按表1可见本章从语言替换、情绪调适和意象结构方面展开分析，以揭示歌词改写的主要类型与内在规律。

表1 歌词对比

歌曲名	原歌词	播出歌词	改动类型	语义归类
Mr. Miss《你怎么不上天呢》	你撩别的女的	你聊别的女的	低俗/口语强度弱化	(语言净化)
Mr. Miss《你怎么不上天呢》	这些年你的内裤都是我洗的	这些年你的内衣都是我洗的	敏感身体部位弱化	(语言净化)
Mr. Miss《你怎么不上天呢》	每次要亲热	一到大扫除	性暗示删除/替换	(性暗示规避)
Mr. Miss《你怎么不上天呢》	多少次想把你掐死	多少次想和你分手	暴力威胁转为关系表达	(暴力意象规避)
Click#15《GetFunky》	I need your sacrifice	You need to realize	宗教/极端词汇弱化	(语义强度降低)
Click#15《Get Funky》	Shake your money maker	Make your body moving	性/金钱暗喻弱化	(性暗示规避)
Click#15《Get Funky》	外套早已脱掉	外套早已扔掉	性化联想规避	(性暗示规避)
和平和浪《丽园便利店》	门口有个少年在抽烟	门口有个少年在抽签	不良行为表述替换	(健康导向)
旺福《两个恰恰好》	小小鸡生小小鸡	小小鸡生小小小鸡	身体/性暗示弱化	(语言净化)
旺福《两个恰恰好》	如果你四处采花蜜，掐掐掐死你	如果你四处采花蜜，恰恰恰似你	暴力词汇替换	(暴力意象规避)
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Buy a one night stand	Bye on night stand	性暗示消解/谐音替换	(性暗示规避)
新裤子《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	我不是流氓	我不是国王	敏感/贬抑标签替换	(语言净化)
刺猬《白日梦蓝》	社会是伤害的比赛	世间是伤害的比赛	体制/社会指涉	(社会系统规避)

			弱化	
黑撒《流川枫与苍井空 /校花与流川枫》	歌名：流川枫与苍井空	歌名：校花与流川枫	标题低俗暗示去除	(语言净化)
黑撒《校花与流川枫》	她拿到华为的签约书	她拿到单位的签约书	品牌/商业指涉去除	(节目方主动调整)
黑撒《校花与流川枫》	她是他的苍井空	他是他的一场梦	成人影像指涉去除	(语言净化)
海龟先生《Where Are You Going?》	主该往哪儿走	该往哪儿走	宗教词汇删除	(宗教敏感规避)
海龟先生《Where Are You Going?》	荣耀的君王被钉死他乡	荣耀的主人被卖在他乡	宗教意象弱化	(宗教敏感规避)
旅行团《Bye Bye》	Bye bye 主义的世界	Bye bye 狹义的世界	意识形态敏感词替换	(政治/意识形态规避)
旅行团《Bye Bye》	我要和你准备 滚吧	我要和你准备 Goodbye	粗俗口语替换	(语言净化)
新裤子《生活因你而火热》	没能继续的革命	没能继续的诗篇	政治语义弱化	(政治性词汇替换)
新裤子《生活因你而火热》	被社会伤害的人们	不能再见的朋友	社会受害叙事转向私人叙事	(社会系统规避)
Click#15《How Come You Leave Me Like This》	Did you sleep with another guy	Did you switch to another side	出轨陈述弱化	(性暗示规避)
Click#15《How Come You Leave Me Like This》	Tell me you motherfuckin' against the law	Tell me you have no lies and have no more	粗口删除/改写	(语言净化)
刺猬《生之响往》	身体 被欲望与药物控制破坏	身体被欲望与烟雾控制破坏	涉毒意象替换	(风险行为规避)
刺猬《生之响往》	灵魂 被恶魔强暴后丢在	灵魂 被恶魔囚俘后丢在	性暴力意象弱化	(暴力意象规避)
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可是我最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死在我面前	可是我最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走在我面前	死亡愿景替换	(暴力/死亡意象规避)

在语言替换方面，节目制作团队对敏感词汇与边缘表达的处理最为直接。数据中呈现的改写带有明确的系统性和一致性。例如，原歌词中的宗教类词汇如“sacrifice”被替换为“realize”，明显体现了综艺节目针对宗教意象的规避策略。这类词汇在多数商业化传播场景中被视为具有潜在误读风险，因此节目在剪辑环节往往主动弱化其象征指向，使其转化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活动类语言。性暗示表达的弱化同样是高频现象，如“Shake your money maker”被改写为“Make your body moving”，原表达中的性暗示内容消失，而动作类表达则在保留节奏与表演感的同时，大幅降低了表达的敏感程度。类似地，涉及脏话、粗俗词语或街头语汇的表达在样本中均被替换为较为中性、更加符合节目整体基调的词语。此外，暴力意象的弱化如将“枪”改为“风”，将“杀”替换为更为抽象的词语，也体现出节目对暴力表述的高度敏感性。无论是针对宗教、性暗示还是暴力，歌词的语言替换均呈现出“去风险化”的显著特征，体现了综艺节目为适应平台传播与审查环境而进行的主动加工。

在情绪调适方面，摇滚音乐本身常具有强烈的负面情绪、爆发式表达和极端情绪象征，但在节目呈现中这些表达往往被弱化或替代。样本中多处表现出将死亡、自伤等高强度情绪替换为更为缓和的表达。例如，“我想重复死亡”被修改为“我想重复 Goodbye”，将直接指向生命终结的极端语义转化为带有离别意味的温和表达，使情绪表达既得以保留，又避免触碰负面心理暗示在大众媒体中可能引发的争议。同样，含有愤怒、仇恨、激烈对

抗等强烈语气的句子通常会被替换为带有遗憾、反思或柔性指向的表达，使其情绪强度明显下降。在某些作品中，原词中对社会挫败、压抑、焦虑等情绪的直白表达被替换为更抽象、更模糊的心理描述，使播出版本的情绪结构更符合综艺节目的整体氛围。综艺节目通常强调温暖、治愈、积极和共情的情绪方向，而避免呈现可能引发压抑、焦虑或极端情绪反应的内容，因此摇滚作品在情绪维度上的改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柔化”趋势。

在意象结构方面，节目呈现的歌词普遍弱化原作中具有社会批判性、现实指向性或象征强度过高的意象。摇滚作品在原始表达中常包含批判社会结构、揭露现实压迫或回应青年处境的象征性意象，而这些内容在综艺节目中大多被模糊化处理。例如，“社会竞争阶级”被改写为“世界是你爱的一切”，原本具有明确社会指向与批判性意味的表达被替换为模糊、普适、非冲突性的文本，象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此外，一些具有明确情境指向的意象也被抽象化，如“现实是无情的枪”变为“现实是无情的风”。这种转换不仅是去暴力化，更是将具有明确情境意味的具象表达转化为抽象表达，使其在节目叙事中更容易与不同观众的情绪经验进行对接。综艺节目在叙事上往往希望构建“励志—情感—成长”的结构，因此偏好抽象化、普遍化的意象，而弱化具有现实批评意味的象征结构。在这一逻辑下，摇滚歌曲原本具有锋芒的象征性表达被明显收敛。

综艺节目在呈现摇滚作品时对歌词进行改写的现象，并不仅仅是出于审查层面的必要性，而是与节目制作机制深度相关。从节目制作流程来看，歌词改写通常产生于“剪辑—审核—精剪”三个环节。在初剪阶段，制作团队会根据经验判断某些词语可能触及监管尺度或不适合节目调性，因此主动提出修改；在审核阶段，根据反馈意见对语言进行风险规避性调整；在精剪阶段，结合节目叙事节奏与舞台表演效果对歌词的语义强度进行最终调整。可以看出，歌词的呈现受到多个环节的共同影响，其最终形态是节目整体考量的结果。综艺节目作为平台化内容，其叙事结构、品牌需求、受众期待和传播环境共同构成了歌词改写的背景，歌词的语言选择和情绪表达皆需与节目整体气质保持一致。综艺节目面对的是大众受众与商用传播环境，因此它对摇滚这一强表达音乐类型的呈现必然形成某种中和、弱化与调整。本章的分析结果也为后续讨论摇滚音乐在平台时代的表达边界与文化意义提供了重要基础。

五、结论与启示

研究围绕《乐队的夏天》中具有代表性的摇滚作品，通过建立“原词—播出词”对照文本，对节目录制与播出之间的歌词变化进行了系统梳理。整体来看，综艺节目对摇滚作品的呈现并非原作的直接压缩，而是在节目制作、频道定位与平台化传播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再表达。歌词在进入节目制作流程后，呈现出以“语言替换—情绪调适—意象结构重塑”为核心的加工趋势，其改写并非零散，而是体现了一套较为稳定的媒介生产逻辑。

从语言层面看，节目组普遍对可能引发误读或引起尺度争议的词语进行替换，包括粗口、性暗示、暴力隐喻、宗教意象以及带有明显现实指涉的表达。替换后的语言通常走向中性化、动作化或心理活动化，使歌词在保持节奏与情绪节拍的同时，减少可能带来的传播风险。此类改写显示了节目在平台化生态中对语言安全性与受众接受度的高度敏感。

在情绪层面，原作中较为强烈的愤怒、哀伤、绝望或挑战姿态，多被重新组织为更温和、更易获得共鸣的表达。死亡、暴力、报复等高强度情绪意象往往被弱化为离别、遗憾或感慨，这种调整使摇滚作品在节目叙事中能够融入整体偏向“温暖—治愈—正向”的情绪基调。情绪调适不仅是规避极端情绪的需要，也体现了节目自身在塑造观看体验方面的考量。

在意象层面，原作中具有社会批判指向、对现实处境的直白呈现或象征性较强的意象，常常在节目中转化为更抽象、普遍的情绪表述。社会结构、政治隐喻、阶级意象、现实困境等内容，在综艺版本中往往不再直指具体问题，而是被处理为可被普遍理解的心理或哲学性表达。这类意象重塑强化了节目的整体叙事和情绪安全性，同时也使摇滚作品的文化锋芒被收敛。

由此可看出综艺节目对摇滚歌词的改写实际反映了一套由审查、节目调性、商业传播与算法机制共同推动的媒介化逻辑。歌词不再只是艺术表达本身，而是在节目生态中被重新塑造，使其符合平台叙事节奏、受众期待与品牌定位。摇滚作品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一种“被动适配—主动重写”的双重机制：既需要在语言和内容上符合播出要求，也必须在节目叙事框架内维持一定的情绪感染力与艺术魅力。

从节目制作的角度看，如何在保证播出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作品原有的表达张力，是音乐综艺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过度削弱作品的象征结构和情绪能量，可能影响音乐人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连结，也会使节目呈现出的作品趋于同质化。节目团队也许可以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为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保留更大的表达空

间。对音乐创作者而言，面对平台化传播环境，准备多版本歌词、提前了解平台表达边界已成为必要策略。创作者并非单纯被动接受调整，而可以在理解媒介逻辑的基础上主动设计兼具原创性与可播性的文本，使作品在不同传播场域中都能获得适当呈现。这种“多情境创作能力”将可能成为未来音乐创作的新常态。从观众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综艺节目中的摇滚文本不应被视为原作的等价呈现，而应理解为节目机制下的再生产结果。总体而言，本研究揭示了摇滚歌词在综艺节目中的改写规则，并从媒介化视角解释了形成这些规律的生产逻辑。随着平台对文化生产的干预日益加强，音乐作品如何在传播机制中保持自身特色、如何在市场逻辑与艺术表达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将成为未来音乐综艺与音乐创作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 Hjarvard S. 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J]. *Nordicom Review*, 2008, 29(2): 105 – 134.
- [2] Couldry N, Hepp A.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 [3] De Kloet J. China with a Cut: Globalisation, Urban Youth and Popular Music[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 [4] Siles I. Music Is Just Right There on Social Med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4, 18: 1 – 25.
- [5] Golden J. The Role of Editing in Media Analysis and Language Arts[J]. *Journal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2010, 2(1): 1 – 10.
- [6] Finnemann N O. Mediatization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J]. *Communications*, 2011, 36: 67 – 89.
- [7] 田瑶. 电视娱乐节目研究综述[J]. 中国电视, 2016(4): 84 – 87.
- [8] 袁振国 主编. 教育研究方法[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9] 叶澜. 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 [10] Krippendorff, K.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4.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Rock Music Lyr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tization

Xing xinyu¹, Binhui Li², Kong xiangwei³, Meng qingtian⁴, Su aimin⁵

¹G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Chuncheon, South Korea; ²Jilin University of Arts, China; ³Sejong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⁴Yeungnam National University, Gyeongsan, South Korea; ⁵Je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 Jeonju, South Kore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ra when media platforms are deeply involved in content production, the text presentation logic of Chinese music variety shows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especially as the dissemination methods of rock music in mainstream variety shows increasingly rely on the regulation of media mechanisms. The rebellious stance, critical sharpness and youth subcultural attributes of rock works make them face a high degree of censorship crisis after entering the platform-based production process. Lyrics often need to be replaced, weakened and reshaped to varying degrees before they can be broadcast. Based on over thirty representative rock works in "The Summer of Bands",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original lyrics - broadcast lyrics" comparison system, and uses descriptiv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to summarize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yrics that have been modified, explaining the underlying expression logic from a media-based perspectiv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writing of rock lyrics in variety shows mainly presents three patterns: "language replacement", "emotional adjustment", and "image structure". These changes reflect the in-depth intervention of multiple media logics such as the censorship system, the brand tone of the program, narrative rhythm, and algorithmic rules at the text level. Although the sub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rock music have been weakened to a certain extent, social expression still exists, and it is retained in a metaphorical, emotional and positive way.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rock music lyrics,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a,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youth culture.

Keywords: Mediatization; Rock music; Lyrics rewriting; Variety shows; Cultural construction